从神话到文化——融合乃存

——万古江河读书笔记

中国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文化融合史，就像认知心理学中人的意识认知来源于自下而上的刺激一样，华夏文明几千年来也不断地接收着自下而上的刺激，它的发展与活力并非依赖于中央的辐射性管控和管理者的令行禁止，而更是来源于广袤的中原大地上各个小文化圈独立又互通有无的交流与发展，最后向上渗透，融入中华文明。

单从我比较感兴趣的神话上来看，中国的神话体系就是独特而复杂的。

从地域上来看，生在中国东西南北四海八方的人们从小接触的神话体系都是不一样的——逢年过节有不一样的对象要祭拜，地方宗庙祠堂各有各的英雄和神明，从江河湖海、风林火山到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各地有各地传承的念想（虽然社会主义接班人应该是无神论者）。南方有湘君、湘夫人、云中君、山鬼、土伯、祝融等，至今还能在屈原的《湘夫人》里领会“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的风貌；北方有洛神、后羿、嫦娥、禺强等，也拜文圣孔子和武圣关羽；东南沿海有独特的海神、海女神话，福建广东一带还有妈祖庙，香火旺盛绵延不衰；更有各地少数民族自己的神，例如西藏的藏传佛教就有自己完整的神佛体系。

而从人物关系和时间逻辑上看，中国神话甚至可以说是混乱而多层的，在故事连续性和人物关联性上非常薄弱，这一点与别的神话相比尤其明显。以北欧神话为例，尽管它有着众多名字又长又难记的神和逻辑奇怪的故事，但它的人物之间的谱系是很容易理清楚的，时间顺序和故事连续性也是比较合理的，一提奥丁、托尔、洛基、耶梦加得、海拉等比较有名的神邸，很多人都能够道出他们之间的联系；而日本神话就更加清楚了，虽然日本有着很多民间小神，但是由于其历史传承的连贯性，日本神话的主神谱系是一脉相承非常清爽的——所有司掌自然的大神都是兄妹伊邪那美、伊邪纳岐的后代。

而中国神话的人物关系就不那么容易理清楚了，女娲、盘古、伏羲、夸父、东皇太一、黄帝、西王母……这些耳熟能详的神邸，分开都各有各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和到一起就仿佛不是一个体系一般，绞尽脑汁都记不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同一个神邸名在不同记载中有着不同的身份的现象也时常出现，例如比较公认的火神祝融在《[史记](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2%E8%AE%B0"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F%A4%E4%BB%A3%E7%A5%9E%E8%AF%9D%E4%BA%BA%E7%89%A9/_blank)·楚世家》中记载为颛顼的重孙，在《[山海经·海内经](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6%B5%B7%E7%BB%8F%C2%B7%E6%B5%B7%E5%86%85%E7%BB%8F/19831171"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9D%E8%9E%8D/_blank)》中却又记载为炎帝的第五世孙。更有一个名号多个版本的现象——俗称的三皇都有不下5个版本，女娲、伏羲、颛顼、炎帝、黄帝、东皇太一、祝融、共工等都曾在里面出现过。

这大概是地方神话文化不断融入中华文明之后小小的后遗症，又或者是中国实在是太过于庞大，而我们作为生于信息时代的人能够接触了解到各地地方文化也不过几十年光景，却想当然地把我们所看到的现状当做一种存在已久的事实，已然忘记了百年前乃至千年前各地信息沟通的不便。

然而，就我们当前看到的神话现状而言，尽管神话体系复杂又混乱，当我们提起炎黄子孙时，提起《封神榜》和《西游记》时，提起太上老君和如来佛祖时，又会很有默契地将自己带入进去，津津乐道地接受里面的神话体系，为脑中本来已经很混乱的神话认知再添一笔——这样的融合不过是中华文化千年来的缩影。

除了不同体系、不同地域的神话不断融入进庞大的中华神话体系之外，在历史长河中也不断有人加入“神仙”的行列——我们从未守着远古时期的故事陈陈相因，而是不断地将我们民族的英雄和气魄融入进去，将山川祭祀和英雄崇拜互相交融——文圣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仁，武圣关羽是忠肝义胆孰能群的义，八仙过海是各显神通，靖魔大帝是精忠报国……后人将他们供奉起来，让他们从“凡人”到位列仙班，挂上神明的牌匾，并向他们求取功名利禄和平安喜乐的时候，全无一点排挤的意思，反倒是喜闻乐见地快速接受了他们的名号和所司的职能。

这便是中国文化在融合过程中独特的包容性——这一点在我国的宗教和信仰上也非常突出。

世界上的宗教多有排他性，尤其是对异教徒的迫害常有听闻。以基督教为例，它是一个典型的一神教，信奉的主神只有上帝一个，因此也以上帝为尊，认为上帝即是真理。在整个欧洲成为基督教的天下时，这一制度性的宗教，虽有普世的理念，却又有强烈的引排他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将异端赶尽杀绝。于是君主、武士与教士，构成一个三角统治集团；教会与政府之间，既联合，又对抗。基督教的神祇，吸收了异端的诸神，基督教的仪式与节日，袭夺了诸族群的仪式与节日。欧洲长期笼罩于定 于一尊的意识形态及精神生活，容不下任何不同的理念。[[1]](#footnote-0)

相比之下，中国的宗教要风平浪静得多——尽管在佛教传入中国之时，曾经因为其拜佛祖的理念与中国文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拜王者”起过冲突，但后来也相安无事，千年以来兴衰交替，最终成为中华文化宗教元素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佛教进入中国，道教组织成形，两者是同步进行的，道教可以说是中国本土宗教对于外来佛教的一个反馈——它借用了佛教的制度与仪式，超越了民间信仰的有限格局。道教内涵极为复杂，收罗了中国文化中许多不同来历的成分——神祇巫现、方士术数、命运承负、阴阳五行、吐纳导引、长生不老……道教的神学与先秦道家的老庄哲学一脉相承，崇尚自然和崇拜自然是其基本的教义，但道教的行为规范却又承袭了儒家的伦理与道德，充分展示了本土思想融合的魅力。

总而言之，道教在南北朝时代的发展，堪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整合, 糅合了儒家伦理、道家哲学及民间信仰，又加上佛教的仪式与借自佛教的僧团与寺庙组织，遂成为聚集各种成分的复杂宗教系统。

就如今而言，社会上鲜少有听闻僧侣和道人起冲突的传闻，也很少有教派之间的斗争，相比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在中东地区的冲突不断（没有冒犯该宗教信仰者的意思），我国宗教可以说相处得非常融洽了。在不断发展融合的过程中，儒、释、道三家也渐渐地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入世、出世、隐世，是“粮店”、“杂货店”、“药店”，还是进取文化、奉献文化、规律文化，都足以证明三者之间既有竞争又有交融，既有对立又有统一——这也是中华文化融合特质的典型象征。

这样融合的观念在文化观上更甚。

中国文化是两元对立又互补的文化——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男女，阴阳，动静……中国文化中没有绝对对立的二元观念，也没有明确的分边界线，并不是非黑即白，而在黑白之间有深深浅浅的灰。就像太极拳的阴阳调和，刚柔相济，中华文化中的对立两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彼此消长，如同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而与之相比，同为世界重要古文明的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就具有鲜明的二元对立的文明观——淡水与苦水，山雨与干风，农耕与牧养，以至光与暗，生与死……无非难以调和的对比与对立，甚至后世的基督教教义中，死亡与复活、善与恶，也是来源于这样的二元对立。但这样瑰丽的古文明最终销声匿迹在了冲突和侵略之下，和这一点截然不同的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融合能力使我们的文化能够长存长青，常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不是在冲突和绝对对立中走向消亡。

而令人感兴趣的是，当今总有人说起“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对立，警惕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而覆灭”。这确实有理，因为现代的文化发展得太过于迅速了，浮躁也好，急功近利也好，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好，都是这样的“快”带来的副作用，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又太长远太古老，太久没有经受过剧烈的变动了，因此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仿佛易碎的古瓷。但我们不能够忘了个人视角的局限性——我们生来就存在的东西，总是容易被我们认为是一直存在的，但我们眼中的“传统文化”，也曾经是和它的“传统文化”碰撞、摩擦而最终走向融合的产物，是一个历史阶段中的融合成果；而我们现在深感浮躁的现代文化，在下一个历史阶段也只是后人眼中或坚韧，或易碎的“传统文化”而已。我个人自始至终相信着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合特性——或许我们又为何要分为传统和现代呢？

中华文化绵延至今，依靠的不是取代和控制，而是创新、融合与发展。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未尝没有过你死我活的观念斗争和当时不可调和的严重矛盾，但这些都随着万古江河的流淌渐渐殊途同归，像溪流汇向大海，像苗木隐于山林，矛盾冲突是一时的，而融合才是文化长久不绝的关键，像万古江河一样，一脉相承，生生不息。

1. 许倬云.《万古江河》[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136页 [↑](#footnote-ref-0)